

本报讯 4月17日,中国共产党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第三次党员大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何建明,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李霄明出席了大会。大会审议通过了何建明代表第二届集团党委所做工作报告和集团纪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第三届集团党委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大会选举何建明为党委书记,葛笑政、梁鸿鹰为党委副书记,党委委员共9人(按姓氏笔画为序):王山、石一宁(壮族)、何建明、施战军、徐忠志、黄国辉(土家族)、商震、梁鸿鹰、葛笑政。大会选举梁鸿鹰为集团纪委书记,徐忠志为纪委副书记,纪委会委员共5人(按姓氏笔画为序):刘方、李晓东、金燕馨(女)、徐忠志、梁鸿鹰。

吉狄马加代表党组和机关党委讲话。他首先代表作协党组、机关党委对集团第三次党员大会的顺利召开、各项议程的顺利完成表示祝贺。他说,何建明的工作报告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上一届集团党委的工作,4年来,集团党委始终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精神,始终立足于加强和改进党建工作,努力推动集团和所属报刊社网各项工作的蓬勃开展,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他代表党组和机关党委对新一届集团党委、纪委提出了工作期望。他要求,集团党委要按照“四个全面”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争做“三个表率”活动;要不断强化理论武装,加强思想工作力度,着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素质过硬的党员队伍;要继续抓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着力营造和谐有力、风清气正的工作环境;要立足改革发展,锐意创新,力争开创出版事业的新局面。

集团和所属各单位共141名党员参加了党员大会。(欣 闻)



张炜：做脚踏大地的写作者

□本报记者 李晓晨

根据似的。这是因为,他的内心里其实还是知道:在无法统计的人数和时间中形成的艺术,其实是谁也战胜不了的,是最强大的。

记者:从乡村走出来的一部分作家现在在艺术上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稳定的状态,他们在写乡土中国时驾轻就熟,就像陈年老酒,但一触及到城市似乎就有些捉襟见肘。我曾简单地想了想,觉得可能是缺乏完整、深刻的城市生活经验,难以深刻地呈现和阐释其中的因果、逻辑、情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炜:我们在城市里谈论文学,长时间离开了更广大的自然和土地,离开了万物蓬勃生长的环境,对文学的理解也会变得浮浅。对于创作个体来说,我们牢牢记得的一点就是:一定不能离开泥土,不能离开大自然,不能离开与世间万物无声的交流。要亲近它们,我们也许会付出一些代价;但如果远离它们,我们则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有人走过了很多的村庄、城市,做过田野调查,考察了一个地区的生活,搜集了一些民间传说,尽可能详细地了解那里的经济情况、教育情况。也许我们未来的全部希望,就是怎样深入诸多问题的反思,包括对广大贫寒的乡村和激遽发展的现代都市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得不正视现代生存伦理的研究和社会正义的讨论。

除了社会层面的深入观察,再就是对土地山川的感知。这也许是更重要的。以前总觉得对一个地区十分熟悉,来来往往也走过不少次,后来才知道自己对这个地区其实所知甚少。乘车而过,或者是几次徒步跋涉还远远不够,那只是取一些皮毛,就像旅行者的轻松超脱会影响我们的认识一样,是难以深入的。

记者:这与现在我们一直说的作家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基本上是一个道理吧。关于这一点也存在很多声音,比如有的说作家一直在生活中,不需要深入生活;也有人认为,作家缺少的是有发现的生活;还有人觉得在家里也能持续创作。谈谈你的认识好吗?

张炜:我总觉得,在行走中,在城市和乡野内部的生活是极其重要的,它将影响和援助以后的写作——可以不直接写它的内容,但作为个人的生活和知识的基础构成,它会给予支持。这种行走与见闻,会将专业的、职业的气冲刷掉一些。专业化好的方面不用说了,但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文字的鲜活会一点点丧失,现场感会减弱。有时候读这样的作品,文字规矩、讲究,技术层面似乎不错,但就是没有生气。一直这样写下去就有问题。所以好作家有时候是要警惕职业习气对自己的侵蚀的。

有的作家喜欢到处跑、折腾自己,不能简单地将其看成性格的原因。作家更爱写作,他处心积虑地要写出好作品——如果他知道了职业生涯对自己的损害,就会不停地走向山川大地。他要把固定的思路 and 习惯,连同疲惫一起冲刷干净,然后再重新出发。经历了几十年的写作

之后,作品应该“重生”。长期不做案头工作,在外面跑久了,有一些字和词都忘记了,也就是有了职业上的生疏感。但是一旦投入工作,会很有冲劲,很有力量。

记者: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在底层的时候,对整个社会生活具有强大的反抗力和不满足感,在那个时候写出来的东西非常感人。那个阶段在你的创作中大概指的是哪个阶段,那种感人的力量根本在哪儿?

张炜:发表作品尚且困难的时期,物质也不丰裕,作家会心弦绷紧。他更多的是一个不平者,他的艺术他的声音会有力量。许多作家的情感之根在农村。乡村的凋敝和消亡让人痛心。城市化是好的,或许难以避免。但怎样做并不好。如果简单地搞下去,那就不免让人担忧。我们的传统文化,很多东西的根是扎在村落里的,它是一个基础,是最后的储存地和创造源。这些散落在田野上的村落没有了,连神话传说也一块儿弄没了,一些习俗和传统也要丢掉了,各种各样生长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一个人脚踏大地,他有一个院落,他在田野里活动,这在柏油路水泥地、在楼房格子里面生存活动是大不一样的。人的感知力和创造力都不一样了,各种各样的想象力都要连根斩掉。

记者:你花了20多年时间创作《你在高原》,走遍山川大地,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去写这样一部“大书”?今天再回过头去看,有没有什么遗憾?

张炜:小说有一些局部文字极不好调度——或者味道出不来,或者没有讲清楚,或者是讲清楚了,味道也出来了,但文字又芜杂了,不够讲究……它要满足各种条件,服从个人很高的文学标准。即便一切似乎都弄好了,但也只是一个局部——你或者会发现这样的改动会影响到其他部分,因为它要辐射到很多方面,这又有了一个与全书衔接的问题,还再次要对榫。所以有时候虽然只是千把字,却要改动几十遍,全书付出的劳动太大了。

如果是一部“大河小说”就必须写得很开,空间感要强。《古船》《九月寓言》等,那些书虽然不是严格地遵照专业的均衡和规范去处理的,但也差不多。比如说从专业角度讲,那些长篇肯定没有过多的逸出和荡开,比较均衡,结构上严谨,个别大胆之笔,也要做得非常讲究。

一个专业作者写了三四十年的,应该有些经验之类。即使很放松地写,也要按照文体规范规律去运作。这是“功力”,同时也是障碍。到了写这长长的十部,应该是突破职业障碍的时候了。在这种漫长的叙述中,从结构上看,有些地方似乎是不拘小节,但它要突破引号——真实的形是精于计算,细节经过了严密的考虑,要写出一种“业余味儿”,这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来自首届中国青年报告文学作家论坛的声音——

敢担当 有锐气 勇创新

本报讯(记者 王觅) 为进一步增强青年报告文学作家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查找青年报告文学作家当下在创作和个人素质上存在的问题,寻找报告文学创作未来发展的新方向,提高青年报告文学作家为人民写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4月12日至13日,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主办、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承办的首届中国青年报告文学作家论坛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出席论坛并讲话。张胜友、李炳银、黄传会、徐忠志、李朝全与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报告文学作家近50人与会交流讨论。

何建明在讲话中说,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报告文学创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青年报告文学作家要准确理解“深入生活”的概念,弄清生活不同层次的状态和内涵,这一点尤为重要。青年报告文学作家要讲求方法,找准问题,在题材选择、叙述方法、作品的艺术性等方面下功夫,取其他文体之长,努力创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优秀作品。除报告文学作家外,还要不断壮大报告文学评论家队伍,进一步搞好报告文学理论评论工作,使创作与评论同时发力。何建明希望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今后创新工作方式,以团队精神形成工作合力,为推动我国报告文学事业持续繁荣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要有时代发声的热情

在信息闭塞时代,报告文学是了解社会现实和历史的一种方式。现在虽然路径和渠道更多了,但报告文学的这个功能仍然未变。苏宁说,没有一种文体可以像报告文学那样,更能直击时代变迁、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唤起民众用理性和良知面对社会问题、国计民生。作为青年作家,我们要有义不容辞的担当和清醒的责任感,与时代同

心,同国家和人民同命运。

李璐璐谈到,报告文学在这个时代的缺位是不可谅解的。虽然现在的新闻渠道日益通畅,网络空间日益扩大,与报告文学作为社会变革中敏感的触角,应当成为社会公众精神、情感、思想重要的载体。

强化问题意识 讲好中国故事

邢小俊认为,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报告文学发展的黄金时代。报告文学作家必须要有创作经典意识,必须心中时刻装着人民,这决定着作品的宽度、厚度和广度。在刘笑伟看来,在当下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网络信息时代,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具备把握大势、分析判断、学习创新和甘于寂寞的能力。

李炳银认为,报告文学作品不仅是文学的,更是历史的。报告文学要坚持真实性,关注人物命运的变化,时时与生活沟通起来,不要人为地与生活隔离。报告文学是写自己的判断,这就要求作家有选择的眼光和判断力、解释力,要有问题意识。

黄传会说,报告文学作家必须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批判意识和独到敏锐的眼光,不能回避和逃避矛盾。报告文学作家必须要有文学性,要写有时代感、紧迫性的题材,但不一定贪大求全。要注重精心选材,结构上要独具匠心,还要注重细节的打磨。

马建辉谈到,报告文学作家的写作要走向内在化,写人写事要深入到精神、人性和灵魂层面。采访要走向内心,以心理分析师的角色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采访。要尽量避免作品中出现大段的抒情或议论性文字,把自己摆在倾听者的位置,控制自己的情感,进行“冷写作”。还应对作品进行认真细致的修改。

丁晓平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谈到,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把握好个人与整体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国与

世界的关系。无论是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都必须避免误读历史。尤其是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更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记叙以及在史料去伪求真过程中,必须要抛开个人情感色彩的狭隘判断。

纪红建说,一些青年报告文学作家的作品之所以枯燥、干巴,缺乏感染力,甚至被指是资料的罗列与堆砌,是因为作家的感情倾注得不够。青年报告文学作家应带着深厚的情感采访和写作,对所描述人物和事件有深刻透彻的认识和了解,善于把各种资料转换成作品的语言和细节,才能弥补作品文学细节不够丰富的缺项。

青年作家要突破自我

张胜友谈到,报告文学作家要加强素质训练,多看经典作品,不断提升自己。一个报告文学作家除需注重文学性之外,还要有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的综合素质,要有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

徐忠志说,报告文学前途广阔,报告文学作家是我国作家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报告文学作家不仅要向自己的传统学习,也要注重学习外国的经典。在李朝全看来,青年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有“任性”、有锐气,有前瞻性的思想与眼光,敢于创新,敢于打破传统。

何宇红认为,俯下身子聆听人民的心声,为人民写作,这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应有的态度。但同时又要站在高处以高瞻远瞩的视角进行写作,这需要长年累月的深厚积累。

谢友义注意到,目前报告文学创作队伍青黄不接,青年报告文学作家缺乏良好的交流平台。为培养新生代的报告文学作家,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在大学开设报告文学选修课,引导青年学子对报告文学的关注,为报告文学的传承夯实基础。

据介绍,中国青年报告文学作家论坛今后将定期举行,旨在为全国青年报告文学作家、评论家、编辑等建立一个共商报告文学采访创作、编辑出版、理论批评、经验交流及其他相关问题的对话平台。本届论坛以主题报告、集体探讨、现场对话等形式进行。论坛已收到论文40余篇,可谓成果丰硕,对青年报告文学作家进一步明确创作方向、激发创作热情具有积极意义。

本报讯(记者 行超) 在中国文学史上,三秦大地向来是人才辈出、佳作涌现的沃土。从上世纪中期开始,以柳青、杜鹏程为代表的陕西作家蜚声文坛,90年代的“陕军东征”成就了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近年来,文学陕军再东征、陕西文学新梯队的出现,显示了陕西文学的蓬勃生命力和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4月10日,由陕西省作家协会和文艺报社共同主办的“陕西新世纪长篇小说研讨会”在西安召开。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阎晶明,陕西省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景俊海,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彦,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蒋惠莉,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和陕西的40余位批评家,共同就陕西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发展情况、特点和未来前景等展开了讨论。会议由李国平主持。

会上,景俊海、阎晶明先后发表了致辞。景俊海说,陕西这块热土上孕育了底蕴深厚、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尤其是优秀的历史文化、辉煌灿烂的革命文化、雄奇壮美的山水文化、颇具实力的现代文化以及备受海内外关注的宗教文化,这种独特完整的文化资源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灵感。阎晶明谈到,陕西的长篇小说创作汇聚着几代作家的辛勤耕耘,新人辈出,前辈作家创作精力旺盛,仍然是陕军的领军人物。陕西的长篇小说创作保持着现实主义的深厚传统,形成了承前启后的优秀文脉,又营造着各自探索、自成一体的创作氛围。

陕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里有着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和氛围深厚的传统文化,陕西文学在表现社会现实和乡土社会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吴秉杰、李星、王鸿生、王山等认为,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是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传统和突出特点,新世纪以来,高建群、冯积岐、陈彦等作家的作品进一步延续了这种写作风格,他们的作品承载的不仅是陕西省,更是整个中国。畅广元提到,陕西作家关注民族的命运,心里真诚地装着老百姓,注目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创造了一系列鲜活的平凡人物和艺术形象,相当充分地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学观。胡殷红从陈忠实、贾平凹、吴克敬、叶广岑、红柯、王妹英等人的作品中看到了陕西人的大气和才气,认为他们一道开创了当代文学的一片新天地。王干说,陕西作家的长篇小说充分体现了陕西人的精神气质,他们的作品有风骨、有风度、有风韵,语言特别有味道,这些特点都深深地根植于陕西的文化土壤。

在现实主义的主流之外,新世纪陕西作家的创作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陕西作家几乎形成了一个群体,他们相互激励、相互启迪,同行之间构成了良性竞争。白桦、贺俊等提出,高建群、红柯等人的作品体现出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显示了陕西文学的多样风格。张陵、孟繁华等关注到贾平凹作品风格的复杂性,施战军说,与大多数陕西作家作品中所体现的明显的“北方”风格不同,贾平凹的作品在精神气质上更接近南方作家,他的作品中有“巫”的特点,是一个难以模仿、难以复制的“奇才”。李震提出要关注陕西文学的“第四极”,他说,陕西作家中,柳青算第一代,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算第二代,杨争光、张浩文是第三代,现在陆续涌现出的“70后”、“80后”作家是第四代,他呼吁批评界要更关注后继作家的成长。

《平凡的世界》是会上的热点话题之一。雷达在总结发言中说,《平凡的世界》显示了昂扬向上的青春激情,其文学精神影响深远。要高度重视陕西文学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独特性,对其评判切忌绝对化。陕西文学为乡土叙事提供了新的经验,乡土化是一种文化和文明,文学的乡土化并没有衰微。评论家是预言家,但预言有时也靠不住。陕西文学这几年贡献比较大的还是陈忠实、贾平凹等,他们在乡土化叙事下了很大功夫,开拓了新的空间,而且陕西文学中的宏大叙事和细节化表现是并存的。相信陕西文学深厚的传统会持续发挥作用,只要善于面对当下现实,实现创造性转化,更具时代精神和创新性,陕西文学定会实现新的跨越。

专家还就陕西文学所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中肯的意见。陈福民认为,陕西作家在处理人物形象方面有突出的表现,但是也容易形成一种成见,成为成见之后会不自觉地把它当成一种叙事来进行表述,然后照本宣科,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厚重而显得单调。谢有顺谈到,陕西作家在写实和写虚方面有一种综合感,但是写实感强,在张扬精神生命的务虚方面有所欠缺。实往往写得很好,虚则多借助意向,实与虚之间很难达到平衡。韩春华说,陕西文学创作仍然存在升腾不起来、深化不下去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